

克拉玛依市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

克拉玛依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克拉玛依市委员会
教文卫体委员会编

《克拉玛依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编
克拉玛依市迎宾路 60 号 邮编:834000

新疆农科院印刷厂
乌鲁木齐市农大路 264 号 邮编:830002

字数:120 千字 开本:大 32 开 印张:4.625 印张
印数:1~1000 册
2007 年 5 月印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准印证(2007)年第 093 号总第 1037 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目 录

回 忆 录

岁月的印记.....	李淑贞(1)
一、沦陷区童年	(1)
二、向往光明	(3)
三、大学生活	(5)
四、从北京到独山子	(8)
五、在中苏石油股份公司.....	(10)
六、在中心化验室.....	(12)
七、在独炼化验室.....	(13)
八、初到克拉玛依.....	(14)
九、土法炼油.....	(15)
十、在克拉玛依炼油厂的日子.....	(17)
十一、“文革”岁月	(21)
十二、在勘探开发研究院	(24)
十三、三次采油专题研究	(28)
十四、我的父亲及海外亲人	(33)
十五、不待扬鞭自奋蹄	(36)
十六、追忆几位老领导	(37)
十七、忆亲人编辑“孤竹骄子”	(44)

十八、后记	(45)
乐为钻井献青春	王炳诚(47)
满怀喜悦忆往事	李洪宾(70)
在南安集海填图	李溪滨(74)

新疆石油资料

黑油山往事	王连芳(79)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新疆石油的国际合作	刘宝宏(90)

石油人物

西北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孙越崎	戴良佐(108)
深情留天山 ——开国上将李聚奎关怀新疆石油片段	刘宝宏(113)
一个奉献者的轨迹	蒲云松(123)
怀念老领导瓦力斯江同志	杨理衡(140)

岁月的印记

李淑贞

岁月流逝,但历史的记忆是抹不掉的,回忆能使我更加珍惜生命。从1951年大学毕业来新疆从事石油化工事业,匆匆已过去了56个年头。其间新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祖国在变,世界在变,人也在变,这里记录了一位普通女性的心路历程。

我的人生感悟,认为最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信念和誓言。

一、沦陷区童年

1937年7月7日,我刚念完小学二年级过暑假,发生芦沟桥事变,华北沦陷。当时我们全家在天津,父亲那时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奉命迁校,哥姐也相继赴昆明西南联大等校求学,家中留有多病的母亲、四岁的弟弟、尚未出生的小妹和我。

为了避免上下学路上日本鬼子的欺辱,我从培才小学(位于法租界的一所教会学校)转学至英租界一所离家较近的慈惠小学就读。

学校来了日本教官给我们开日语课,进行奴化教育,大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啦、大东亚圣战啦等等。在那个时候,我所看到和听到的都是烧杀掳掠、血腥镇压。日本鬼子经常到老百姓家搜罗铜制铁制的日用器具,甚至连正在做饭的铁锅也抢走。他们号称“献铜献铁支援圣战”,实际是制造枪炮子弹杀中国同胞。

日本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很苦。粮食靠户口本配给,有时得排一整天队才能买上口粮,能买上玉米面和高粱米是好的,能吃

上大米、白面的大多数是汉奸之类的人物。我家靠母亲排队买口粮，我们小孩子轮流换她吃饭。记得有一次我快排到售粮窗口了，日本鬼子突然换了个地方售粮，于是队形大乱，人群拥挤着奔向新的地方。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看着开怀大笑，还放狼狗追赶要弄我们。有的老弱病残被狗咬了，我也被狗咬了一口，真狠死日本鬼子了。

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我家一般吃高粱米饭或窝头，副食是炒黄豆或白菜汤，虽说没有多少油水，在当时也算好的啦！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利用假日找了一个给人抄写文章的活。每天干 10 个小时挣 3 毛钱，可以买 6 个烧饼，弟弟、妹妹每人吃两个，我和母亲每人一个。烧饼一面有芝麻，吃起来好香呀，在当时是最好的享受。

苦难接踵而至。1939 年夏天津海河涨水。有一天我随邻居大人到河沿看水，先是慢慢上涨，突然波涛汹涌，冲上岸来，像张开大口要把我们吞没。太可怕了，我们拼命往回跑。离家不远处看到许多人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在胡同口堵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涌上来的水一丈多高，侥幸我已跑到楼上，心都快跳出来了。以后来往行人买物品都靠行船，物价上涨，生活更难了。我终究是孩子，看着行船好玩，找了一块门板放到水中，叫弟弟、妹妹上去，自己来划，结果沉下去了。我被救上来后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我因病辍学一年，病好以后不甘心留级，就跳班了。至今一听到洪水我仍心有余悸，我非常同情所有受灾的人。

小学毕业后我在天津的广东女中上初中，听说这儿的老师爱国。教我们班国文的是位女老师，她总是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当班长喊完“起立”，她便指挥并领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大家满腔激愤，使出全身力气高声地唱，唱出我们的仇和恨。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叫大家坐下，全班鸦雀无声，日本教官来检查也一无所获。这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发自心灵深处无声的呼叫。没多久这位老师不来给我们上课了，听说被解雇了。那时我是全家留在天津最大的孩子，母亲是家庭妇女，又多病，无经济来源，靠变卖度日。我懂得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知道只有努力用功读书，长大才能救国，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总得奖学金。比较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一生能吃苦，勇于承担责任的性格，对我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向往光明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女中的老师很多来自南开中学。南开迁校后有些不能离津的老师到广东女中任教，他们带来民主、自由、严谨、开放的南开校风。有些老师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课讲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且能引人入胜。如历史老师在讲到八国联军攻打我国时，编了一段很有趣的顺口溜：“中比英美荷日意葡法”。意即中国要比过英美何日（那一天）意大利扑灭法国，至今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课余时间我喜欢读文艺作品：冰心、巴金、鲁迅、茅盾、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著作我都读，还读了古典小说《红楼梦》。我最喜欢巴金、屠格涅夫的著作。当时对鲁迅、高尔基的作品有的地方还看不懂。从文艺作品中得到许多快乐和启示，我喜欢民主、光明和自由，我从中学会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些对我以后的成长和所走的人生道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了，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那么多苦难，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那时我念完高中一年级，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广东女中地处天津法租界绿牌电车道附近，环境噪杂。为了好好念点书，转学至离我家较近的圣功女中就读，希望将来能考入名牌大学。

圣功女中是座外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成立于1915年，教学质量比较好。我最喜欢听萧老师讲的物理课。他讲课深入浅出、

引人入胜，甚至使你着迷。他讲牛顿三大定律时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带上一年的食品和心爱的狗，乘航天飞机去宇宙探险。不知飞了多长时间，他带的食物吃完了。一天他的狗突然打开弦窗跳了下去，他想这唯一心爱的伙伴在太空中粉身碎骨了。第二天清晨透过舷窗玻璃朝外一看，他惊讶了：狗在窗外冻死了。同学们，你们猜这架航天飞机的位置在太空什么地方？”大家猜不出，他接着说：“这架航天飞机和狗都在各个星球引力平衡的那个点上。”当然这是假想，但用这个故事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讲透彻了。萧老师讲课从不死啃书本，使你感兴趣而不断地去追求探索，着重把概念搞清楚。如他在课堂上讲物体质量和重量的区别时，也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考问大家，他说：“从前有两个人做买卖，买东西的人要求卖东西的人站在人行道上称，而卖东西的人坚持在人行道下面马路上称，为什么？注意：用的是弹簧秤。”当然这也是个概念问题，虽然人行道和车行道就差那么一点高度，但买卖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就有争执。弹簧秤称出来是物体的重量嘛！实际这点差别是不存在的，但从理论上讲就是有区别。我真喜欢听他讲课，我爱上了这门科学。在考试时我画了一个在大学丛书上看到的图，说明一项力学原理，萧老师觉得我的卷子超出满分，得了 105 分。其他学科如数学、化学老师都讲得好，确定了我报考大学学理工的志愿。

1946 年秋父亲回天津北洋复校。尽管他颠沛流离吃尽了苦，但因他在筹备西北工学院时不善于团结其他院校师生，办事主观，加上当时政府不给经费，工作非常困难，心情不好。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弄得民不聊生、学运迭起。当时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记得那时我校办学经费奇缺，圣功女中校长竟动员学生去舞厅等地募捐，有的学生居然向在舞厅中狂欢的美国士兵卑躬屈膝，目睹这一切，我真是觉得受了奇耻大辱。

1946年12月24日晚，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当时北平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发出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呼声，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天津学生组织抗暴游行示威，串联我校参加。当女一中、广东女中、南开中学的游行队伍路过我校时，校长竟叫门卫和治安人员将学校大门锁上，并扬言谁参加开除谁。通过这些事件，使我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贪污腐化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罪行。

1947年暑假我从圣功女中毕业，一心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为使多灾多难的祖国富强起来，我决心学工，实现“工业救国”的梦想。

三、大学生活

1947年夏我报考了5所大学：清华、北洋、燕京、辅仁、工商。上清华（那年是和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只能报考其中一所）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第一天考试时忘了带准考证，回家取来时已经考完一门了，因此落榜。其余4所大学均被录取，我想选择北洋或燕京。北洋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教学质量高，理论与实践结合好，名闻中外，学生成绩优异，我报考的是化工系。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也很有名，我报的是医学，预科二年后转协和六年，共八年毕业。究竟上那所大学呢？我在高中时很喜欢生物学，记得那时解剖青蛙，在显微镜下观察，很有趣。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那么多人牺牲了，做名医生，救死扶伤是很伟大的。上北洋工学院也是我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但是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学校：一来他是国民党，口碑不好；二来和他在一起我的自由度相对差了些。父亲和伯母主张我学工，他们说我这人太粗心，去考大学这样的大事居然忘带准考证。我承认粗心的缺点，一天大大咧咧地，不修边幅，像个男孩子样。他们说：“当医生不把剪刀给人缝在肚子里才怪呢，粗粗啦啦的人去学工吧！”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

运、我的人生轨迹。

我于 1947 年秋季入学，上课用的都是英文课本，课程有物理、化学、微积分、工程画等。教授用英语讲课，考试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写实验报告。由于在中学时学的是普通英语，很多专科名词没学过，加上我不太喜欢英语，开始很不适应。我在大学一年级着实抠了一年英文，到了二年级就好多了。化工系二年级开专业课，课程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电工、热工、微分方程等。我选修的第二外语是德语，给我们上课的女教授叫赵林克梯，她会 13 国语言，给我们上课用英语讲授德文。因为是选修课程，从思想上不太重视，特别是德文语法没学通，考试只得 76 分，后来因为没机会用它，现在都忘光了，其他课程学的还不错。

说起来真有点后悔，悔不该和我父亲在一个学校。我父亲这个人比较顽固，思想保守，有高傲自大不善团结师生的缺点。尽管他治学严谨，但因方法不对，伤害了一些人。当我听到这些议论时感到很尴尬甚至难堪，增加了我的思想压力。如他考教授，当面给人下不来台，伤害人家的自尊心，给学生上课叫学习好的学生坐在前排等。有一次在家里我故意考他，问他 $\sin(A + B) = ?$ 他马上回答： $\sin(A + B) = \sin A \cdot \cos B + \cos A \cdot \sin B$ 。我又问他 $\sin 2A = ?$ 他说 $\sin 2A = 2\sin A \cos A$ 。这些都是般三角公式，我想他若回答不上来，我就把他的缺点和问题指出来，但我没有考倒他，没能达到目的。我承认他脑子好、学问渊博，但只有这些长处作为工学院院长是不够的。谁都希望自己的父亲在别人的心目中受到尊重。

1948 年春假期间，在北京参加了“平津唐学生春季大联欢”，3 月 28 日晚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万名学生营火晚会。这是地下党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迫害斗争的一次活动，使我很受教育。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包围了广场，我们齐声高唱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民青都是地下的，不能公开。我虽没参加过任何组织，但思想倾向革

命。我班有位同学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给我写过好几次条子,告诉我谁是地下党,谁是民青。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我当机立断,把条子交到我猜中的地下党负责人手中。结果这位给我写条子的民青被开除了,听说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被牵连。五十多年后我当面向他说明那次是他做错了。不论别人怎样想,我认为当时我做的是对的,保护了那些搞学运的地下党和民青同学。

1948年11月,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激烈的是“反南迁”活动。10月底学校公布了国民党政府布置北洋大学南迁的决定。反对南迁的同学压过了反动学生和不明真相害怕战争的学生。我父亲那时是工学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争取他,地下党派学生代表何国模来我家给他做工作,周恩来同志亲笔给他写信挽留他。12月份解放军逐步包围了平津,北洋大学学生搬到河北女师暂住。为了躲避父亲要求我和他一起走,我和同学始终一起住在女师没有回家。最终父亲一个人于解放前夕离开了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多次参加庆祝天津解放游行、慰问解放军、街头文艺演出等项活动。姚树人是化工系学生会主席,他不但功课好,全班第一,而且多才多艺,教我们唱革命歌曲,组织我们去中学联欢、跳集体舞、搞宣传等活动。那时我真是非常快乐。当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主办的大学暑期学园,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化工系从大三开始分专业了,有普通化工(制酸、制碱、造纸等)和炼油化工,我选了炼油化工。化工原理、工业化学、物理化学等都在一起上课,石油炼制、炼厂设计等课程单独上,还选了有关石油基础知识的课程如石油钻采、石油地质等。化工系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多是是国内知名教授,如张远谋(化工原理)、萧连波(工业化学)、刘云浦(物理化学)、甘怀新(石油炼制),选修课石油钻采是卢克君。我们的理论课学得很扎实,知识面很广,使我们从学校走

向工作单位时不存在专业对不对口的问题,无论放在什么岗位,很快就能适应,进入角色。

大学三年级暑假我们去工厂实习,我们这个小组分配到本溪炼焦厂实习。按照我们所学的专业应当去炼油厂实习,但那时国内仅有的几座炼油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我们这个小组就到了炼焦厂。按道理炼焦厂所产煤焦油分馏与我们所学炼油化工专业比较接近,可是因为战争遭到破坏,没有修复,所以只得去炼焦厂实习。本溪炼焦厂所产焦炭是供炼铁厂用的,我们分配在炼焦炉上测定炉温和内燃气吸力。这个工作很苦,在炼焦炉上打开测温口,用光学温度计测温度,一般1000℃左右,要穿木头底鞋和石棉工作服,排气口温度160℃多度,稍有不慎就会烫伤。测完脱掉石棉衣,内衣汗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通过这次实习增强了我对搞工业的感性认识,学习了工人师傅吃苦耐劳精神和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的优良品质。通过两个月的实际操作锻炼,为毕业后进入工厂工作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此外我们还去过很多厂矿进行参观学习,如本溪铁矿、开滦煤矿、唐山陶瓷厂等。

大学四年级基本上就确定了我毕业后搞什么专业了,我下定决心从事石油专业,因为石油是利国强民的工业。

1951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正值我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全国统一分配。我们集中在北京,由中央人事部组织学习,动员服从国家分配,到工矿企业、到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央领导朱德、陈毅、郭沫若等给我们作报告,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这一级毕业生到西北去的就有十多人报名。

四、从北京到独山子

中央人事部分配去西北工作的方案公布了,北洋大学有采矿系的王炳诚、张从哲、张毅,化工系的戴菊生、姜国清、李淑贞、王国才。因为从北京到大西北几千里的路程只有我一名女生,铁路只

通到西安，分配后我和姜国清结婚了。我们于 1951 年 8 月 2 日从北京出发，到西安后各地分配到大西北的学生都集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待了九天，有的去了玉门，我们 7 名同学踏上了 3000 余公里的进疆路程。西北军政委员会安排部队转业去新疆工作的干部和家属，加上我们 7 名学生，共一百多人，乘四辆大卡车从西安出发，沿途全部按供给制待遇。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起来收拾行李，装上卡车，人上车后坐在行李上。卡车是露天的，没有篷子，后面还要装几大桶汽油以备沿途使用。公路路况不好，汽车颠簸很厉害，越来越荒凉，人烟稀疏，没有青菜吃，能吃上面条油泼干辣子就不错了。晚上住路边小店，一个大土炕，男女都躺在自带行李上面。有时我们同学没有地方睡，就打开行李睡在汽车轮子旁边。好在是夏季，空气流通，倒也舒服。黄土高原漫无边际，一望无垠，只是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情调。

一进新疆境内第一站是星星峡，过了哈密继续往西北走到了骆驼圈子，渴得张不开嘴，继续走到木垒，见不到一个人。因为要找水喝，敲一家老乡的门，老乡出来告诉我们：“乌斯曼来了，快走！”乌斯曼是新疆一名反动匪首，据说彪悍无比，都带有武器，能倒挂在马肚子下面射击。我们刚上车走不远就听到马蹄声，赶快下车躲在一山坡后，转业军人手持武器保护我们，幸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了木垒继续西行约 200 公里总算到达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我们大家长吁了一口气，真是不到新疆不知祖国版图之大。尽管我们一路吃了那么多苦，早晨寒风刺骨，中午日晒难挨，晚上冻得无法安眠。俗语说到新疆是：“朝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一路没有火炉，也没吃上西瓜，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早花光了，连 8 分钱的邮票都无法买，走了一个多月也没给家里写一封信。到乌鲁木齐后新疆的领导同志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是新疆解放后第一批分配来疆的大学生，我是唯一的女大学生。

从乌鲁木齐又往西北行 200 多公里于 9 月 2 日最终到达目的地——当时尚设在独山子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从北京到独山子，总计走了 4000 多公里，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啊！尽管我们吃了些苦，但苦得快乐。我们有追求，有理想，理想的实现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 7 个人没有一个叫苦，一路上歌声不断，唱得最多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五、在中苏石油股份公司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是解放初期我国和苏联合资经营的石油联合企业。早在上世纪 30—40 年代，苏联曾和新疆省政府合作在独山子钻井采油和炼油，但规模不大，1944 年以后停办。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乌苏油矿筹备处经营一年多之后，由三区临时政府管理，有一座小型釜式炼油装置间断生产。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后来了许多苏联专家，按协议各部门的领导前三年由苏方担任正职，中方担任副职，三年后轮换。我们刚从学校来的学生是实习生，跟着苏联专家学习。

到独山子以后，男女同学分住集体宿舍，在大食堂吃饭。为了迎接国庆，在安排工作岗位以前，工会抽我去搞文艺节目。王国才的爱人李曼玲从广西来了，也被抽调搞文艺节目。我们二人一合计，建议组织一支腰鼓队，得到工会支持，买了腰鼓和钹，订制了服装，有 8 个民族的 20 多人，自编自导，不到半个月就排练好了。除了在矿区到处表演外，还去乌苏、奎屯及附近农场表演，深受各民族群众的欢迎。就这样我们欢度了建国两周年国庆。

国庆节过后给我分配的工作岗位是跟着苏联专家格莱赛文学习建炼油厂。开始搞测量，在学校没接触过经纬仪和水平仪，就向专家学。最初帮他们拿测杆、钉木桩、放线、提火炉（冬天手冻僵了烤火用）。先放大渣油池的线，然后就是电站、蒸馏车间泵房等等。每个建筑物都是按图纸定位，挖地基、罐基础浆、测标高、砌砖，和

工人一起干活。那时工人实行的是计件工资，我每月还要计算每人完成的工作量。通过实践边学边干，学到很多东西，从工人师傅身上学到了不畏艰苦、奋发图强的精神。

1952年7月，一座近代化的蒸馏车间及其附属装置建成投产了。这时又分配来一些大学生来独炼工作。我和刘静瑜（同班同学，比我晚到独山子两个月）、汪祖铎（原在中心化验室工作）、万德禄（大连石油专科学校毕业）4人组建独炼化验室。每人带一个班，每班10多人，都是刚参加工作文化程度较低的姑娘，8个民族，语言不通是最大的困难。化验室是配合现场生产做控制分析，产品出厂做成品分析，每小时或半小时取样分析一次。试验方法用的是苏联标准（ГОСТ），先后有两位专家指导过，但时间都不长，主要靠我们几人搞培训。语言障碍是最大的困难，总工程师马尔克扬经常来布置工作，要能听懂他说什么，教给操作人员如何做分析化验，光靠示范远远不够。我们几个骨干过去都没学过俄语，又没有专门翻译，怎么办呢？只有刻苦学俄文。开始我们早上五点去俄文班学习，因为倒班有时保证不了，只有利用业余时间拼命自学了。不到一年时间，基本做到能听懂、看懂，能说得别人懂。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不容易！八小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化验员同时要做好几个分析项目，要按时去现场和半成品罐、成品罐取样。特别是冬天，到几十米高的大罐上去取样，罐顶是斜坡，很滑，不小心会掉下来的。取样戴手套不方便，不戴手套手指碰到铁上就可能因温度低被冻结粘到上面，用力一拉就会掉下一块皮来。那时我的职务是主任化验员。

在我班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至今我心有余悸。卓娅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塔塔尔族姑娘，一天早上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纱质连衣裙上班，说下午四点下班后要和男朋友一起去登记，领取结婚证。大家高兴地祝贺她，她也穿上工作服开始工作了。卓娅的岗位是去现场取渣油样品做分馏，在取样时不慎渣油滴在开襟

工作服里面的新衣服上，回来后她倒了一点汽油想洗掉新衣服上的污渍。那时分馏用的是明火巴氏喷灯，时值盛夏，室内温度很高，汽油蒸发遇明火燃烧起火。我正在做另外项目，只听到一声惨叫，回头一看卓娅全身都是火，很快跑到走廊上。恰好对面来了位苏联专家叫斯他令古里的，一拳把她打翻在地，她痛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火就灭了。卓娅这时遍体鳞伤，惨不忍睹，马上送医院了。我们大家轮流护理她，安慰她，经过数月的治疗出院后，面庞依然很漂亮。当时卓娅才18岁，如果她不跑出去，化验室内都是易燃品，会导致全化验室大火爆炸。后来卓娅回家疗养，我因调动工作离开独山子，再没见到过她，但很想念她。通过这次火的教训，我终生重视安全生产。1953年我被提拔为化验工程师。

六、在中心化验室

中苏石油公司中心化验室原设在独山子，1954年春迁到乌鲁木齐，是配合石油地质勘探的试验室。1954年春，我因爱人工作调动，也随之调至中心化验室工作。当时有微古生物组、岩相组、油层物性组、光谱组、泥浆组、原油组、气组、水组等，我被分配至原油组，任务是进行原油物理、化学性质分析。我们建立了全部原油分析项目，后来还建立了沥青分析项目。那是没有苏联专家指导，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岩相组、水组等都有苏联专家指导。做原油评价没有真沸点蒸馏仪，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现在看来不太标准，但当时解决了实际问题，对勘探获得原油样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做出了详细分析。我们组长是陈德新，后来我也担任过组长。徐晓蓉是我组年龄最小的，勤奋好学，后来成为骨干。

在乌鲁木齐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位苏联女医生。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很小，一个两岁，一个不到半岁，都得了麻疹转肺炎，生命垂危。我爱人工作单位建筑托拉斯总经理潭杰耶夫找来一位有名的女大夫（是他夫人，可惜没记住她的名字）给我两个女儿看病。她